

# 總結歷史經驗，提升“一國兩制”實踐自覺性自信性

楊允中\*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sup>1</sup>

正確認定“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兩個十年來的變化與發展，正確認定兩個特區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規律與經驗，這是當前審視形勢、提升認知、排除阻礙、堅定信心的出發基點。對於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來講，則要力求做到判斷不失據、行動不失控、信心不打折，為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再上新台階及時補充正能量。

## 一、對港澳兩特別行政區二十年來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檢視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sup>2</sup> 這是毋庸置疑的歷史結論，也是一切具客觀理性認知的國人和世人的普遍共識。如果對這一精準判斷作出進一步思考，那麼“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衡量指標至少應包括：

- 一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
- 二是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
- 三是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
- 四是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
- 五是治港港人、治澳澳人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
- 六是特區正面積極創新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
- 七是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
- 八是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應有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

作為新興政權、新興制度載體，特別行政區第一個十年可以認定是其奠基期，第二個十年可以認定是其完善期，進入第三個十年，則應被認定為基本成熟期。兩個現有特別行政區歷程 20 年上下的實踐，宏觀上微觀上應該如何自我認定、如何被認定，答案其實並不難做出。2017 年 7 月 24 日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已融入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壯闊征程，走上了與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寬廣道路。”這就是“時代賦予‘一國兩制’基本國策成功實踐的新內涵新境界。”<sup>3</sup>

\*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鄧小平便全面精準地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看大陸，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也在大陸。”<sup>4</sup> 在國家空前強大，搭中國快車漸趨時尚，特別行政區與國家發展融合度快速上升的今天，無論從法治法理上認定還是從民族共同體與實際受益度、獲得感觀察，認知上的缺位和行動上感情上的脫節都是不應默認的。“‘一國兩制’是中國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sup>5</sup>

故此，要始終準確地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主與次、上與下、整體與局部一時一刻也不容出現誤判誤導。“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sup>6</sup> 實踐也證明，“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前無古人的大膽構想和無例可循的深度探索，也是毋庸置疑的世紀創新，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也是古老中國文化和東方文明的創新。作為國家級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前沿實踐基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存在價值與特定意義不容低估，澳門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規律與經驗分外重要與寶貴。

## 二、兩大基本社會制度求同存異、互補發展的可能性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它的生產發展速度應該高於資本主義。”“當然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sup>7</sup>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sup>8</sup> 鄧小平逾 30 年前作出的上述精準判斷，如今已被中國和平崛起鐵一般事實所證明。在兩大基本社會制度並存共生、和平發展的當今時代，力求對一些基本社會現象看得真一些、準一些，不作簡單化表面化絕對化判斷，十分重要也十分有益。只要尊重客觀實際、堅持實事求是，那麼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真孰假，自然會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現實，對於深入而系統地瞭解與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屬性與制度特徵提供了最直接、最具體的課堂，無論對於域內居民或境外人士都是最便捷最有效的觀察窗口。

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和當代人類文明進化史充分證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非只能水火不相容地對抗與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各自優勢，但依然都有繼續優化、完善的必要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制度特徵差異是：前者始終堅持公有制應佔主導地位、共同富裕是最高價值目標，而後者則堅持私有制是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這中間，無論從進化論還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前者都具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但問題在於理論上的制度優勢與現實中優勢發揮絕不能劃等號。令人十分欣喜與鼓舞的是，當代中國已進入“強起來”的發展階段，從 2010 年起已成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按現價GDP中美兩國佔比已從1989年11.39倍縮小到1.63倍，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第一外匯儲備大國、惟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sup>9</sup> 根據《財富》雜誌評定的全球500強，內有115間中國企業躋身，保持連增14年。其中，2017年全球十強企業中，中國的國家電網、中石化集團、中石油集團分列二、三、四位；2017年全球利潤最高的十大企業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分據二、三、四、五位。<sup>10</sup> 在體量迅速擴大同時，體現中國創造、中國智慧的重大成果也令人眼花繚亂，2016年7月中國天眼——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投產運行，2017年7月全球最長港珠澳跨海大橋貫通，全球運算最快超級計算機“神威·太湖之光”屬於中國專利，交通領域最快捷舒適的高鐵在中國率先實現了網絡化。雖因國情、世情複雜多變，未來發展之路仍不易走，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正令人信服越來越充分地展示出來。

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現實表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可以達致包容互濟、互利共贏，在空間時間兩個維度上實現嫁接、集成、整合、共榮，在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上驗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大膽突破與制度創新。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一國兩制’是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步構成的殊途同歸、異曲同工；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前提下對其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示。”<sup>11</sup>

社會現實也清楚不過地表明，在履行基本國策、滿足“一國兩制”方針大方向大原則前提下，針對兩個特區不同區情民意、針對兩地發展階段發展水平的差異、針對兩地主流民意核心價值的調整過程，加速推動港澳各具自身特點的發展模式的總結梳理，是一種既具普遍價值又具特定意義的當下發展要求。

香港的實踐是名符其實的史無前例，其高開放性、高兼容性全球著稱，形象、影響難能可貴，受到應有肯定是理所當然的。香港也有充分條件在第二個20年全面展示潛質優厚的國際競爭力，合理把握發展與創新，再創輝煌。澳門高穩定性、高包容性、高和諧性十分突出，並在過去18年間實現了罕見的跨越式發展，其成功實踐的價值與意義不容低估，經驗與規律有待進一步深入發掘、梳理。在第一個特別行政區尚未完全滿足國人期待前提下，推動澳門經驗的適度總結並備受認同，無疑是一步好棋。挑戰與機遇共存、成就與問題同在，兩地都應正確看待形勢、正確認定“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不能變，“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不折騰不內耗是時代挑戰。

### 三、新征程上實踐新要求

“回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長歷程，我們可以自豪地說，20年來，香港依託祖國、面向世界、益以新創，不斷塑造自己的現代化風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sup>12</sup> 習近平“七一”講話在充分肯定香港特區兩個十年巨大發展變化的同時也嚴肅地指出：“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社會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還缺乏共識，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sup>13</sup> 在如此重要會議上，對於特區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如此明確而具

體地作出強調，令居安思危要求具體化，其意義不僅對香港而且對澳門均自不待言。

### (一) 要堅持初心本源

要確保正確實踐，就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sup>14</sup>，就要堅持國家統一大業、民族偉大復興既定內涵與要求，這就是“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sup>15</sup> 因為“一國”之本和“兩制”之利實質上是一個統一整體，具意願、要求、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兩者之間也構成意志與願望、利益與福祉的最大公約數。“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sup>16</sup> 任何具客觀理性觀察能力的人，對關聯度如此深遠的社會現實不宜視而不見、我行我素，不宜有意或無意加以歪曲或背離。

### (二) 要堅持底綫思維，該出手時就出手

鄧小平早在逾 30 年前便指出：“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sup>17</sup> “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的制定權屬於中央政府，國家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屬於中央政府，當然，對基本國策、基本方略實施的導向、監督權也份屬中央，這是憲法、基本法確定的國家憲制體制與原則。過去 20 年來伴隨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出現的事事非非表明，中央管的不是多了，而是不夠；基於對國家宏觀利益、核心利益和特區整體利益的考量，國家該管的一定要管，該出手時不出手或晚出手必然誤國誤民。個別政界人士妄圖令特區同國家平起平座、甚至用資本主義否定社會主義的行徑，是十分有害的，也是不應長期存在的。

### (三) 發揚澳門精神，提升正確實踐自覺性自信性

精神的載體是人，當代人尤其要關注自身與親友圈核心價值觀的調整，“香港雖有不錯的家底，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sup>18</sup> “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民主和諧”為核心的“澳門精神”<sup>19</sup>是前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所倡導，它被賦以深刻的時代內涵，要堅守發揚。其實，“澳門精神”還可以補充為“愛國愛澳、自尊自重、自強不息、自主命運”。澳門精神的調整和養成，本身就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的踐行過程，對於十分幸運的當代澳門人來講，這既是準確判定國情區情、準確認定發展規律的需要，同時也是自我修煉、自我完善過程中提升自覺性、強化自信性的需要。在這個英雄輩出的創新時代要做到與時俱進，就要提倡做既懂國情國運又肯走創新實踐新路，既懂傳統中國文化又懂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的當代澳門人，做無愧於時代、無愧於國家、無愧於民族的一代新人。

### (四) 兩大結構深度調整要同步抓緊

澳門現階段面臨的可能是產業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同時深度調整。產業結構中的博彩一業獨大、適度相對多元化舉步維艱，不僅特區內部多年來是一個十分熱暢話題，而且舉國上下無不為這道難以破

解的現實難題擔心。說這是澳門的一項深層次矛盾有待高度關注、有待多維投入、有待頂層與基層智慧形成合力求得破解，應不過分。但澳門社會結構的深度調整尚不為人們所關注。澳門是個博物館式社會，回歸後更成為備受關注的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熱土，它是寶地也是福地，這裏自由度、開放度、和諧度、包容度均舉世罕見，十分難得。但結構欠均衡、深度發育不足、公民意識上調空間很大，也是不容否認的現實，故上述兩大深度調整直接同新形勢下“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踐必然構成正相關。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sup>20</sup> 根據“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sup>21</sup>的發展定位，澳門在文化領域的開發開拓值得寄以高期望值，因為在過去 500 年間澳門不僅是中西文化碰撞、契合的一個傳統基地，而且也逐步成為影響遠播的嶺南文化重要基因庫。深挖文化寶藏、擴充同澳門特色與時代價值相關的高文化內涵項目大有必要，其中興建澳門歷史文化名人(見附表 1、2)主題公園，應認定為澳門多元化、國際化、時代化的一項可行選擇。

表 1 澳門歷史上的中國政界、文化名人

姓名	年份	簡介
湯顯祖	1550-1616	代表著《牡丹亭》，其 21 齣“謁遇”提到“番鬼們建造的”香山澳多寶寺(即聖保祿教堂)，與莎士比亞齊名
徐光啟	1529-1633	助利馬竇譯《幾何原本》，編《農政全書》、《崇禎曆書》，明末來澳督造火炮
屈大均	1630-1696	清初詩人，著有《翁山詩外》、《廣東新語》等多部，曾長期居澳，並有多首詠澳詩作
吳歷	1632-1718	大畫家，1682 在澳加入耶穌會，常住聖保祿教堂，著《澳門袖珍冊》及《三巴集》
印光任	1691-1758	清首任澳門海防軍民周知，著《澳門記略》，任內推出多項治澳措施
張汝霖	1709-1769	清澳門同知，《澳門記略》雙作者之一，多有著述
林則徐	1785-1850	民族英雄，道光十八(1838)任湖廣總督，嚴禁鴉片，二年後任兩廣總督，重創來犯英軍，1839 年 9 月 3 日曾來澳視察
容闓	1828-1912	中國首位獲美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曾在澳門馬禮遜就讀，開創中國留學教育，培養詹天佑、唐紹儀等名人
張之洞	1837-1909	先後任湖廣總督、兩廣總督，倡“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任內多與澳葡交涉
詹天佑	1861-1919	在澳考取幼童留學名額，夫人譚菊真為澳門人，女兒、孫兒長期居澳
鄭觀應	1842-1922	大思想家、大作家、大企業家，在澳完成巨著《盛世危言》
康有為	1858-1927	戊戌變法主角，1896 來澳辦《知新報》，時為全國三大輿論基地之一
梁啟超	1873-1929	康有為合作者，共同在澳籌辦《知新報》
孫中山	1866-1925	第一位執牌華人西醫，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首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澳門是其第二故鄉
朱執信	1885-1920	民主革命家、理論家，1915 年後以澳門為據點策劃武裝起義，協助孫中山完成《建國方略》
高劍父	1879-1951	1905 在澳學畫，創嶺南畫派
葉挺	1896-1946	當代中國著名將領，北伐獨立團團長、新四軍軍長，20 世紀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長居澳門
冼星海	1905-1945	出生澳門，中國現代大作曲家，《夜半歌聲》、《在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作者

表2 澳門歷史上的葡萄牙和西方文化名人

國籍	姓名	年份	簡介
[葡]	賈梅士 Luís de Camões	1524-1580	葡國大詩人，名著《葡國魂》( <i>Os Lusitânos</i> )
[意]	利馬竇 Ricci Matteo	1552-1610	世界級文化名人、大學者、大科學家，著《幾何原本》、《坤輿萬國全圖》、《利馬竇扎記》，第一位精通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
[德]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明欽天監正，編《崇禎曆書》、監造火炮
[比]	南懷仁 Verbiest Ferdinand	1623-1688	清欽天監副，製黃道經緯儀、天體儀等多部，編《康熙永年曆法》、《神威圖說》等
[葡]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襄助創制曆法，《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翻譯，擅宗教音樂
[英]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譯《聖經》，創英文報，編《中英詞典》
[英]	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世界著名畫家，後半生僑居澳門
[葡]	飛南弟 Francisco H. Fernandes	1863-1923	孫中山救命恩人(1895)，廣州起義失敗後協助孫逃亡海外
[葡]	庇山耶 Camilo de Almeida Pessanha	1867-1926	葡萄牙文學象徵主義代表人物，1894年來澳後任教職，多次代理法官，其雜文集《中國》記述了孫中山在澳門接見中西知名人士情景
[葡]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1912-1923	教育家、歷史學家，各類著述逾150部

總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容挑戰，中央政府權威和對特區全面管治權不容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度秩序不容挑戰，利用港澳對內地進行破壞滲透活動，絕不允許。強調和諧包容、強調多元共存，不等於拿原則作交易，不等於消極自流、無所用心，不等於犧牲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 四、制度建設永不過時

##### (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宣傳、研究力度有待加大

“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須正確理解。特別行政區並非只有資本主義制度，特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不能簡單地戴上資本主義帽子。準確地講，“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sup>22</sup> 全面管治權就是國家主權的核心內涵或行使國家主權的具體化，因此早在回歸那天起已得到落實，《“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加以強調絕不是甚麼“收緊”或新增要求的問題。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即“一國兩制”政治制度不能視而不見，既要準確把握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又要對中央全面管治權下的高度自治權保持理性認知。行政長官制、政府核心架構、依法施政、以民為本等諸多方面均發生質的變化，其中，又集中兩大方面，一是公權力性質、職能、效益的轉變，二是居民身份與權利保障上的轉變。

## (二) 對憲法與基本法設定的特區憲制秩序，推介要常態化、精準化

宣講法的規範與權威首次要講憲法規範及其權威。正是“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sup>23</sup> 這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亦應成為慣例與傳統。對於基本法的宣傳推介更應在原有基礎上登上新台階。一個十分明顯的問題便是對基本法的理解不能各取所需、隨心所欲，不能原則上尊重而具體實施時有意無意令其被變形，而且在此類問題上導致出現認知與行動失調失控的又往往是高層或有影響力人士包括學術理論界名人，故更宜重視重視再重視。

## (三) 法治與法制建設成績不小，但完善缺口仍大

作為法治社會，澳門特區 18 年來堅持依法施政強調以人為本，法的權威受到尊重，違法行為受到追討，但法制建設特別是原有法律清理表面上雖已完成，其優化建設仍步履維艱；作為法制較完善地區，彈丸之地擁有一套完整法律體系，每年平均有 10 部以上新法出台，實屬不易，但立法質量不佳、文字粗糙、過分依賴外籍專家，普法投入與消滅犯罪仍不匹配，高層人士對法包括基本法的理解、詮釋時有表面化、簡單化，這一切對政府綜合治理、有效管治很難不產生負面效應。

建設“雙強”（強政府強社會並舉）體制恐怕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對於特區政府，不斷提升管治能力與管治理念，積極作為、與時俱進，依然重要；對於特區居民，不懼挑戰、不誤戰機，港人治好港、澳人治好澳，走好未來之路還要爬坡、還要付出、還要堅持正確思維。

## (四) 既抓制度建設也抓認知體系調整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sup>24</sup> “一國兩制”所以定為當代基本國策，主要是基於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確保國家和平統一與民族偉大復興即中國夢的實現，因此其散發的震撼效應如此之大，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方面的創新如此之深，實在不容低估。

走好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新路，是新形勢新境界的客觀要求，也是各界居民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現實需要。在積極推動並參與制度建設同時，適度倡導健康思維、健康價值觀及對“一國兩制”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自信甚有必要。要令特區受到更大關注支持、奪取更佳發展成效，首先要自我調整到位，自尊自重、自潔自愛，這包括“不斷擴大愛國愛澳政治光譜畫出最大同心圓”<sup>25</sup>，一心一意抓發展，及時搭乘國家快車同向前行，抓住產業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同步深度調整，提高青年一代接班可靠性與全民綜合素質，等等，其中，也包括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關注與研究。

張德江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 20 週年座談會的講話裏，把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理論研究，健全基本法理論體系，作為深入推進基本法貫徹實施的四大舉措之一，“尤其要加強基本法研究人才培養，加大對研究工作的投入和保障，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研究隊伍，不斷推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論支撐”。<sup>26</sup> 這是“一國兩制”理論戰綫知難而上、全綫拓展、擴大戰果的進軍號，也是“一國兩制”實踐步入成熟階段的必然要求，有條件參與其事的所有人士當深思而踐行。

## 五、結語

以中國共產黨十九大為標誌，我們國家業已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基本方略十四項中的第十二項。它事關現有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的切身福祉，事關全體中國人民的期盼與要求，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終實現，當然也事關一種全新社會生態、全新發展模式、全新價值觀念、全新認識論的日趨深化與成熟。相應地，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實踐也意味着進入了一個要求更高的新時代。“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這是擺在當代港澳廣大居民面前的當然而明智的選擇，也是新時代、新矛盾、新願景、新征程向人們提出的必要要求。

### 註釋：

- <sup>1</sup>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0月19日，第03-05版。
- <sup>2</sup> 同上註。
- <sup>3</sup> 王志民：《推進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再創新輝煌》，載於《澳門日報》，2017年7月25日，第B2版。
- <sup>4</sup>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218、358頁。
- <sup>5</sup>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7月2日，第02版。
- <sup>6</sup> 同註1。
- <sup>7</sup>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312頁。
- <sup>8</sup> 同註4，第255、373頁。
- <sup>9</sup> 《再揮“301”大棒，山姆大叔圖個啥》，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8月16日，第01版。
- <sup>10</sup> 《五大最賺錢公司，內銀包四席》，載於《大公報》，2017年7月22日，第A9版。
- <sup>11</sup> 楊允中：《“一國兩制”——兩個主義對話對接、對壘對決的智慧選擇》，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7年第2期(總第32期)，第9頁。
- <sup>12</sup> 同註5。
- <sup>13</sup> 同上註。
- <sup>14</sup> 同上註。
- <sup>15</sup> 同註1。
- <sup>16</sup> 同註5。
- <sup>17</sup> 同註4，第221頁。
- <sup>18</sup> 同註5。
- <sup>19</sup> 同註3。
- <sup>20</sup> 同註1。
- <sup>21</sup> 根據國家發改委、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



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澳門的發展定位是：“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sup>22</sup>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sup>23</sup> 《習近平論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141頁。

<sup>24</sup> 同註2，第101頁。

<sup>25</sup> 張德江：《與澳門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17年5月10日，第A2版。

<sup>26</sup> 張德江：《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5月29日，第02版。